



国防大学 2 071 3120 9

文史资料选辑

合订本

第 5 卷



中国文史出版社

目 录

洛阳战役蒋军就歼纪实	邱行湘(1)
我在川西起义的经过	邓锡侯(17)
襄樊战役康泽被擒记	董益三(31)
抗战前后我的几点回忆	龙 云(47)
重庆战时生产局和美国经济援华政策	翁文灏(61)
吉会铁路签约经过	赵东凡(69)
九一八事变前后日寇和汉奸在东北的 阴谋活动	王子衡(75)
一九三一年宁粤合作期间我的内幕活动	刘叔模(105)
抗战时期国民党的反共教育	顾树森(125)
《申报》与史量才	冯亚雄(138)
改组派回忆录	何汉文(147)
桂系的秘密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会	何作柏(164)
我所知道的顾维钧	杨玉清(174)
英美烟草公司史话	陈子谦 平襟亚(182)
清末广东的“闹姓”赌博	商衍鑒(193)

洛阳战役蒋军就歼纪实

邱 行 湘

—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底，我从国民党军第九十四军第五师调任青年军整编第二〇六师的师长。奉命之后，即往洛阳到差，着手整顿部队，并积极备战。这时，蒋军在东北、华北、中原各战场连吃败仗，从战略进攻转为到处挨打的被动局面。我在南京国防部一厅一处处长苏时和二厅少将参谋邱希贺那里看到表册，知道蒋军已经没有一个完整的军（或整编师），即是说，几乎每一个军都被解放军吃掉了全部或一部。形势逼着蒋介石不得不将所谓“御林军”的青年军拉上第一线，并且调派一批“打手”做青年军的指挥官。

二〇六师原隶陆军总部郑州指挥所指挥，该指挥所的主任是孙震，副主任是张世希。一九四八年一月，我接到蒋介石的命令，改归胡宗南指挥。当时我很诧异，为什么远在西安的胡宗南来指挥洛阳的部队？直到裴昌会到洛阳以后，我才了解蒋介石的战略意图是急于修通陇海路潼洛段（潼关至洛阳），打通平汉路北段，使西北与中原、华北连成一气，并图确保西安、洛阳、郑州三大城市据点，以稳定中原战场的局势。二〇六师划归胡宗南指挥，正是蒋介石在这样的战略意图下所作的军事安排；他当时的着眼点，也无非是加强胡宗南的指挥力量。裴昌会是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兵团司令（司令长官是胡宗南）。一九四八年二月，裴昌会兵团进至洛阳附近新安、陕州一带，裴本人与其妻子氏乘坐一辆吉普车到了洛

阳。当时洛阳的土豪劣绅、贪官污吏还逼着洛阳居民用黄土铺路迎接裴进城。裴是胡宗南的先行，为胡宗南在洛阳设立长官部。在裴未到洛阳之前，胡宗南在洛阳设有电台，有参谋一、二人及情报人员常川驻洛，搜集情报。不料宜川一战，蒋军大败，刘戡、严明战死，所部全军覆没，中原蒋军闻之丧胆。当时，胡宗南因关中告急，把他原驻洛阳以西的新安、陕州一带的裴昌会兵团星夜调回西安。邱清泉兵团徘徊于陇海东段徐州东北地区。胡璉兵团远在漯河。而孙元良兵团慑于整三师的被歼，龟缩郑州。突出在陇海西段的洛阳，显得十分孤立。

宜川吃了败仗以后，蒋介石也感到洛阳的形势不妙。这时又恰值蒋介石召开“行宪”伪国大的时候，他想在洛阳打个“胜仗”来为伪国大的召开装装门面，同时还想守住洛阳，来挽救中原的颓势。

二

一九四八年三月初，蒋介石派飞机将我接到南京，面授机宜。我按预定召见的时间，来到黄埔路“主席官邸”等候传见。这时，有一个侍从副官对我打招呼说：“邱师长，这两天老头子因为战事和沙面事件的关系，脾气不好，你要注意一点。”旁边另一个穿海军服的侍从秘书笑着说：“老邱没有什么关系。”传话出来，“主席”要我进去。我进入蒋的办公室，见他板着脸孔，流露出紧张而又忧虑的情绪。他首先谈到有关青年军兵员补充、部队训练以及洛阳守备等事。他说：洛阳是秦、晋、豫三省的要冲，是中原与西北联系的要点，一定要作长期“固守”的打算；要以洛阳为中心，组织民众，训练民众，加强保甲工作，扩大地方武装力量。他又说，洛阳的地形很好，易守难攻，还指手画脚地指示防守的部署，说：“洛阳的邙山、龙门、西工都非常重要，必须加强工事，研究防守，教育部队。飞机场也很重要，必须确实控制。”又问我：“洛阳有无警备司令？”我说没

有。他马上走到办公桌上写了一张条子，加封了我这个兼职。接着他又问我：“有什么长处？”我听到很奇怪：蒋介石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问我这句话，使我一时无法置答。我考虑了一下，觉得无非是他想在这个时候要我为他去拼命。我答复他说：“我没有什么长处，练兵打仗还有点经验。”蒋介石听了，连连点头。他接着对我说道：“军事的成败，关系到党国的安危，如果不打败共产党，我们将死无葬身之地。”蒋介石说这番话，显然是为了增强我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斗志。但是我内心里有许多苦闷，又不敢对蒋介石说明。我抱怨他不了解下情，不知道二〇六师究竟有多大力量，短短的两个多月，又怎么能够把这个残破的烂摊子搞好？至于洛阳处境的艰危，我心中是有数的。我也有些贪生怕死，这时我又正和柳克述夫妇给我介绍的一位女友谈恋爱，因此对接受守洛阳的任务，内心不免存在矛盾。但蒋介石对我既然如此“器重”，也就甘于“临危受命”了。同时，我在南京听到“国大”有很多人指摘陈诚是常败将军，我随陈很久，听了很不服气（这时陈诚由东北逃回上海养病，我没有见到他），决心为他争争面子出口气。当我和女友在机场握别的时候，我对她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三

我回到洛阳后，即积极从事备战活动。首先加强军事控制。遵照蒋介石的指示，成立党政军联席会议，实行党政军一元化，以便独揽大权。在党政军一元化的措施之下，洛阳附近的专区以及所属各县统归我指挥。我帮助他们组织地方武装，恢复各地方的反动政权，并给他们很多的弹药补充。此外，还成立了洛阳警备司令部，设稽查处、军法处，统一军、宪、警察、特务的指挥系统。

旋即着手调整二〇六师的内部人事，以加强战力：调升第一旅旅长赵云飞为二〇六师副师长，以原任第五师副师长余有壬调任第一旅旅长，余未到职，由赵云飞兼任。调第五师参谋长康步高任

二〇六师第二旅副旅长。原任二〇六师第二旅副旅长刘宏远调二〇六师参谋长兼洛阳警备司令部参谋长。人事调整的原则,是将“既亲蒋又能打仗”的人安排作指挥骨干;不符合要求的,一律调走。如赵云飞是二〇六师的三朝元老,他虽出身东北军,作战经验也少,但很忠实于蒋介石,亦颇得蒋介石父子的信任。第二旅旅长盛钟岳与蒋介石父子亦有直接联系。在南京面蒋之时,我即提出调用人事的具体意见,得到蒋的同意。

写到这里,需要说明蒋经国操纵青年军人事的一些事实。二〇六师其所以在洛阳战役中表现得顽固不化,蒋经国平时灌输的政治毒素是起了重要作用的。青年军团级以上人事除由蒋介石直接掌握外,蒋经国也从中操纵。青年军各师人事调动,事先也要通过蒋经国。蒋经国当时以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局长的名义,发号施令,干预一切。他本人则与青年军各师长直接拉拢;而青年军各师长更以捧上“太子”为“荣”,并以此为升官发财的门径。例如青年军的高级军官一到南京,蒋经国就是工作再忙,也要亲自招待,陪游请客,称兄道弟。就在这些所谓不拘形迹的往还中,“太子”并没有忘怀提高反革命士气的宣传工作。洛阳战役前,我到南京,蒋经国请我在碑亭巷曲园酒馆吃饭。他用“自己人”的口吻对我说:“国共不两立,我们一定要在军事上取得胜利,一定要把部队的战斗力充实起来。装备方面,你们可以和我经常联系,逐步调整。现在广设失业失学青年学生招待站,可以源源补充兵员。”他并要我“组织民众”,“训练民众”(实际上是加强特务控制)。

蒋经国掌握了青年军政工的全部人事。青年军各师的新闻处长(即政工处长)必须通过蒋经国,才能由国防部新闻处委派。在我接任二〇六师的同时,蒋经国派了一个原任万县青年中学校长的赖钟声接任二〇六师新闻处长。赖是清华大学毕业生,参加青年军以后,又进过青年军干部学校,是蒋经国的得意的嫡系门生。赖到二〇六师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和我创办了一个《革命青年》周刊,着重向官兵灌输“一个党、一个政府、一个领袖”的法西斯毒

素，来加深反共反人民的思想基础。赖钟声也经常到部队讲话，鼓动官兵为蒋介石卖命。政工系统另有电码密本，并指定专用电台与蒋经国直接联系。

与调整人事的同时，即着手补训工作。在一九四八年一月，二〇六师还不足三个团的兵力。二月底以前，分由西安、郑州、开封、许昌招收了三千余青年学生，全部调整补充为六个步兵团，但兵员不足。第五团还是有官无兵，这个团派到湖南接收新兵，没有参加战斗。因为青年军士兵缺乏作战经验，遂在全师抽调二百个青年兵成立一个军士队，从事基层干部的训练，并打算把他们充当新的骨干。部队训练还采用了解放军的办法，组织连队互相参观和评比，并针对当时“老兵”闹复员的情况，进行反动的政治教育。

青年军士兵既缺乏作战经验，兵力又不足，要固守洛阳，就不得不特别寄希望于工事的加强。我刚到洛阳的时候，对洛阳的守备，究竟是以主力守西工（国民党中央军校洛阳分校校址，距城西二公里），或者以主力直接守洛阳城，尚举棋不定。至于外围据点的龙门、邙山，则决心不守，以免分散兵力（蒋介石的意见是要守龙门、邙山的）。起初，我认为如以主力直接守城，因为没有宽广的射界，难以发挥火力，又难以形成多数的独立支撑点，一门突破，势必全城瓦解，故有意以主力据守西工，以一部控制城垣，利用飞机场和西工四面八方的宽广的操场作为依托。这样，不但可以充分发挥火力，又可以使每一个据点既能互相支援，又能独立支撑。但因为西工没有既设工事，又为时间所限，我最后仍决定以主力直接守城，以一部控制西工，并指定较有作战经验的第四团一个营配合民工构筑工事，担任西工的守备。

构筑工事是备战中的突出问题，我们反复研究，动了不少脑筋，最后决定以“小面坚”的办法来对付解放军的“人海战术”（当时对解放军猛冲猛打的诬称）。我们判断战斗开始以后，各据点之间的联系势必为解放军所隔断。因之，无论粮弹、医药事先都必须储备充足，使每一个据点都具有独立支撑的条件。

在各据点的本身，巧为编成火网，并有上、中、下三层的射击设备。上层以行瞰制射击，中层与地面成水平，形成交叉火网。下层工事是防御解放军云梯越壕、爆破攻击和坑道攻击。壕底同样是构成交叉火网，阵地前沿多挖有五公尺深和宽的外壕。另有伪工事，如桥梁、通道等，以吸引解放军爆破手接近，利用两侧闭锁工事进行射击，又可越出闭锁口捕捉爆破手。这些伪工事由在阵地外是不易侦察得到的。据点工事一般是没有直射的火口，但城垣的射击设备很差，直射火口多，火网构成不易，又难形成多数的能够应付四面八方的独立支撑点，一处突破，全线就要瓦解。因此，必须在城门外和城墙角广设独立小据点，以补直接守城不易发扬火力与难以形成多数独立支撑点的不足。瓮城外都设有二、三道工事，这是守城的主要依靠。

我考虑到一旦城破，全线就要瓦解，因此，还在洛阳城内西北隅射界比较宽广的洛阳中学，构筑了核心阵地，并以此为基点，再辅之以巷战工事，以期到处扎根，步步为营，进行持久的挣扎。洛阳土质坚硬，既干燥又不易倒塌，在沿铁道线附近的据点，有一部分是利用钢轨做掩盖，抗力更大。

为了扫清射界，进行顽抗，我不顾人民的死活，大拆民房，划到哪里，就拆到哪里。先后被拆毁的民房，总计在一千五百间以上。尤其以东门、东北门沿城墙脚的半边街拆毁得最多，除掉留下一个清真寺以买好回民外，几乎全部拆光。西工电灯厂附近也拆毁了半条街。居民被迫离开了他们祖祖辈辈所安居的温暖的家庭，流浪街头。当时表面上虽也有安置办法，实际上是把他们赶进了窑洞和没有门窗的西工散房，使他们不仅失去了房舍，而且使他们失去了职业，饥寒交迫，无以为生。

我们这种为害人民的做法，也得到洛阳专员刘焕东、洛阳县长郭某和洛阳议长史美吟等的支持，经过会议决定后，交由专署具体执行。在拆迁民房过程中，群众曾集体请愿，扶老携幼，苦苦哀求。我昧着良心，不予接见。我向刘焕东说：“这有关洛阳的存亡，顾不

得这许多了。”在大拆大毁之中，美丽的牡丹古城被挖得千疮百孔，西门外周公庙的名胜古迹，破坏尤多。当时国民党政府考试院长戴季陶还派有专员看管周公庙文物古迹，而拆毁仍略无顾忌。美丽的牡丹和无数的碑碣，都被埋葬在战壕中。城北的司马懿墓，也被挖得满身窟窿。

仅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至一九四八年三月的三个月时间内，征用的民工即在十万个工日以上。被征民工多是洛阳和洛阳附近各县的城乡居民。他们被迫自带口粮和工具，有的因劳累饥饿而死。直到战斗开始后，还扣押了许多民工掘坑挖壕，因而在战斗中伤亡者亦有之。

这时由于平汉南段已被解放军斩断，洛阳军粮来源断绝，兵站支部在我的支持下，实行武装下乡征购。当时物价飞涨，国民党法币几成废纸，所谓征购，实际上就是抢掠。地方部队更是走到哪里，吃到哪里，因此民间搞得十室九空。据兵站支部报告，当时抢存的粗细粮食达一百万斤以上。一九四八年二月，我到黑石关，亲眼看到居民过春节的时候，连红苕也吃不上，多数以树皮草根充饥，当时民间普遍流行一首歌谣：“生了儿子是老蒋的，打下了粮食是保长的！”这是劳动人民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血泪的控诉。

二〇六师是青年军，兵员的补充仰给于失业失学青年学生的招募。但地方团队就地抓丁，日夜催捉，鸡犬不宁，在洛阳造成了严重的骚扰。河南省主席刘茂恩为了要迅速恢复他的起家本钱——武庭麟的十五师和扩充他的地方团队，利用其房叔洛阳专员刘焕东为他大办兵差。胡宗南也肆无忌惮地在河南招兵，他的新兵大队驻在郑州、洛阳，到处奸淫掳掠。洛阳地区的地方团队，实质上都是土匪武装，扰害人民，无恶不作。但蒋介石仍然不放松这一股反共反人民力量的运用。蒋在南京召见我的那一天，也找过地政部长李敬斋谈话，命他到河南原籍把地方团队发动起来，参加战斗。过后，蒋又委任土匪出身的王凌云为豫西绥靖区主任。

一九四八年三月初，自裴昌会兵团西撤以后，情况日趋紧张，

洛阳人心惶惶，蒋介石的视察组长刘伯龙和他的组员们看到形势不好，先后偷偷地跑回郑州去了。我和赖钟声商量如何稳定人心的办法之后，下令洛阳的人员和物资一律不准外撤，并将二〇六师存郑州的武器弹药和一切军用物品全部运到洛阳，连住在郑州的军官眷属也搬到洛阳来，实行背城一战。我还命令中央银行运储充足的库存，不许撤退。这时中央银行洛阳分行经理是常乃铭（孔祥熙的人），作中国农民银行恩施办事处经理多年，与我交好。他听了我的话，运足了钞票，撑住了气。我又令铁道运输部门除调运物资和兵员来洛阳外，不准将车辆外调或向郑州撤退。我们还有意识地与洛阳各界头面人物频频往还，相互邀宴。在酒食征逐的场合，我们假装镇静，并大吹其牛，宣称“固守洛阳不成问题”。洛阳的土豪劣绅把我当作四平街的“勇将”，到处宣扬，我也不置可否。总之，只要能够稍有助于稳定人心，不惜采取任何手段。这样一来，人心浮动表面上是暂时制止住了；至于实际上前途如何，自然人人心中有数。

四

三月初，迭接郑州陆军总部指挥所通报，得知解放军主力集结洛阳以南之襄禹地区，有进攻洛阳的可能。那时裴昌会兵团已经西撤，孙元良兵团龟缩郑州，洛阳非常孤立。我认为如一旦战事发生，孙元良的川军是最不可靠的。我虽寄希望于胡璉兵团，但它远在漯河。根据蒋军过去作战经验，依靠援军解围而得到成功的实在很少。

郑州指挥所副主任张世希在电话中说，郑州也有被攻击的危险，没有更多的兵力增防洛阳，只答应将二〇六师的第二团归还我们，并加派两个炮兵连。我为了妄图固守防地，只有“通天”一术，于是连电蒋介石，迅速由北京空运第五师一个团来洛阳增防。蒋介石回电说空运困难，没有得到结果。

三月五日以后，根据郑州和洛阳专区各县情报，得知解放军主力已由襄禹地区向北疾进，洛阳情况更趋紧张。当时我召开了两个紧急会议：一个是召集各部队长作了军事上的部署；一个是召集洛阳党政军联席会议，动员军民配合作战。会议决定，伤运和粮弹输送，由城厢居民负责；补修工事，随时由警备部、警察局征用民工抢修。到解放军快要兵临城下的时候，商会会长向我提出起用洛阳附近的“妙道会”的问题。我只知它是一个迷信组织，什么“刀枪不入”，我并不相信，但当时认为这也是一种反共的力量，也就表示同意。这个反动组织在战时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我就不了解了。

当时据守洛阳的兵力：主力是青年军二〇六师，计步兵五个团，另有骑兵团（临时编成）搜索营、迫击炮营、榴弹炮兵连、战防炮连、野炮兵连、重迫击炮连、工兵营、辎重兵营（内有汽车兵一个连）、军士队（临时编成）。除二〇六师外，另有一个宪兵连、“人民服务队”、豫西师管区步兵一个连、保安第一团和沁阳、济源流亡在洛阳的一个保警大队，总计兵力约两万人。“人民服务队”（约百余人）是类似过去康泽的“别动队”的一种反动武装组织，总负责人是刘培初，成员大部分是由青年军二〇六师青年兵调充，他们原在陕北担任建立蒋介石的区乡基层政权工作，刚由陕北调回洛阳。青年军有军事、政治教官的编制，二〇六师的教官达二百人，均为上、中校阶级。这些教官之中，有几十个是挂名领饷，远住武汉、西安各地，其余在军中的也无事可做，我到二〇六师之后，开缺了不少。当洛阳紧急的时候，我将他们编成十多个督战队，配置在各城门及城内外各重要据点，以加强对部队的控制，逼迫官兵为蒋介石卖命。

当时根据以“小而坚”的防御体系，固守洛阳，配合外围兵团，聚歼来犯之“敌”的方针，布置了三道防线、五个战斗地区。三道防线是：1. 外围据点：龙门、邙山以冯克恭的保安团及沁阳、济源伪保警大队据守；西工电灯厂由二〇六师第四团一个营据守。2. 城垣

守备：由二〇六师主力据守。3. 核心阵地：由二〇六师第一团一个营及师的军士队据守。城垣守备又分为五个地区：1. 东门地区：东门、东门城墙以及东门外之九龙台、潞泽会馆，由第三团据守，归第一旅旅长赵云飞指挥。2. 南门地区：由南门、南门外含洛河边各据点，以搜索营、宪兵连、“人民服务队”各一部据守。归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刘宏远指挥。3. 西门地区：由西门含西门外之周公庙、火柴厂，以第六团据守，归第二旅旅长盛钟岳指挥。4. 北门地区：北门、东北门含城外东西火车站，以第一团（欠一营）及工兵营据守，归第一团团长龙章铎指挥。5. 核心阵地：以第一团第一营及师军士队据守，归师直接指挥。以第二团、第四团（欠守西工的一个营）为总预备队，归第二团团长封期速指挥。至于防御重点则放在地形复杂而低洼的东门。

政工人员、宪兵连、“人民服务队”各一部配合城区警察，统归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指挥，严密控制保甲。他们公开的任务是发动民众，抢修工事，救护伤兵，处理俘虏，实际上是对洛阳城区人民进行特务控制，防止来一个里应外合。

根据各方面的情报，洛阳一战，势不可免。三月六日，郑州指挥所主任孙震打来电报命令，主要内容是：

“1. 豫西共军主力约四个纵队，连日由襄禹地区北进，有进犯洛阳企图；

2. 孙元良、胡琏两兵团应速向洛阳前进；

3. 二〇六师附榴弹炮一连、重迫击炮一连，应面守洛阳既设阵地，协同外围兵团聚歼来犯之敌；

4. 该师粮弹由兵站总监部补足一个月使用基数。”

三月七八两日，郑州指挥所副主任张世希又多次用电话问我洛阳备战的情况。他要我面守一个月，并说：“这是蒋主席的命令。”我当时回答张世希说：“守一天算一天，尽我们的力量吧。”张上希要洛阳守军“固守”一个月，这说明蒋介石调兵遣将已经处于非常困难的窘境。当时，郑州指挥所还深怕郑州被攻，无法招架。

因此，孙元良兵团在洛阳战役中，自始至终存观望态度，甚至不敢越雷池一步。根据我在抗日战争和反人民战争中长期作战经验，援军是靠不住的，要守住洛阳，必须从“独立作战”着手。因此，我们将解放军进攻和我们如何防守作了较为全面的估计和准备：

1. 解放军主力如由西门突破，大兵团作战容易进出，但城外地形开阔，伤亡大。以解放军进攻许昌、徐水为例，多是利用城外地形复杂、房屋毗连、容易接近城垣特别是居高临下的地带发动攻势。
2. 解放军主力由东门突破的公算最大，因为东门外的街道纵深很长，房屋与城墙较近，容易集中优势兵力，进行猛攻，而东门城墙低，工事强度差。因此，我们在东门外增设了两道地堡和三道障碍物，以图弥补以上的弱点。
3. 解放军主力由南门突破：城外地形复杂，城垣低洼，这是有利条件，但南门近处洛河边沿，纵深小，不利于大兵团的进出。因解放军善于夜战，南门突破的可能性亦大。
4. 解放军由北门、东北门突破的公算小。因为东北门、北门至西门，城垣高，城外地形开阔，城内西北隅又有广场，如果解放军由此突进，易被歼灭。根据各战役经验，解放军不会利用这种地形进行突破的。

我是基于以上的理由，来作防守洛阳的工事设施和兵力部署的。

五

解放军主力越临汝、登封之后，直扑洛阳。三月九日，揭开了洛阳攻防战的序幕。当日十二时，解放军渡伊河逼龙门，据守龙门的冯克恭保安团闻风即向宜阳西逃。当时另一路解放军由宜阳至洛阳间渡洛河北进。我当时判断解放军已展开对洛阳的东西两方面的包围攻击，遂命远射炮兵集中火力向关帝塚射击，以遮断龙门至洛阳间解放军的进出通道。西工方面则对西工桥进行封锁射击。十六时，骑兵队被解放军击溃，逃窜洛阳，经收容转到洛阳以东地区沿洛河两岸活动，十八时该骑兵队几被全歼。炮火阻挡不住英勇的解放军前进。

三月九日十八时至二十四时，解放军先后占领洛河桥头阵地和东门大街，西工方面亦有战斗。是晚由郑州调回作为洛阳的总预备队的二〇六师第二团，在应付当时紧急情况之下，集结东门外加强工事，亦被解放军击溃，窜入城内，混乱不堪。团长封期速失踪，后来查知他逃到部队中的京剧团里躲藏起来了。

三月十日拂晓，解放军猛攻东车站，据守东车站之工兵营全部就歼。此后，解放军对东门外之九龙台、潞泽会馆多次发动猛攻未下。这时，这两个据点与城内蒋军还能取得联络。是日，西工、西门外尚无激烈战斗。南门战况较紧，参谋长刘宏远多次告急，我也十分为南门的情况担忧，后来暂时稳定下来，我才松了一口气。是日中午，解放军又攻占西车站，城内曾抽出两个营分由西门和东北门向东西火车站出击，战至十七时，毫无进展，入晚即撤入城内。

三月十一日，全线展开激战。开始时，南门战斗最烈。我忧虑南门的杂色部队可能因沉不住气面过早地为解放军所突破，经警备部参谋长刘宏远率部增援，反复挣扎，情况稍缓。九龙台、潞泽会馆、西工各据点，解放军一时攻打不下，并有伤亡。我即电报蒋介石大事吹嘘说：“我军士气旺盛，迭挫凶锋，斩获甚众……。”蒋介石立即回电打气，大意谓：“以寡胜众，殊堪嘉奖，希激励三军，坚守阵地，配合外围兵团，聚歼来犯之敌。”随后蒋经国也打来同样的电报。我和赖钟声把这些来电马上转达到全体官兵，以鼓舞反革命斗志。

三月十一日晚，彻夜激战，东门尤为激烈。各处频频催补弹药，要求增援。是夜风雨交加，天昏地黑，战至午夜，解放军已突入东门，占领瓮城，我要第一旅旅长赵云飞尽一切可能把突入瓮城的解放军打出去，把突破口夺回来。我非常焦急，深怕赵云飞完成不了这个任务，便亲自指挥步炮兵南北夹击，反复挣扎，均未奏效。这时我十分忧虑，感觉到如果城垣过早地为解放军突破，这个仗就只好打了，这是在洛阳战役中成败所系的一个最重要的关键。我便要重炮兵猛烈射击，继续遮断东门通道，再次发动反扑，但效果

不大，而东门的突破口却被解放军愈撕愈大，终于不可收拾。由东门突进的解放军继续向东门大街发展，有几处屋顶上发现解放军的机枪声，给城内守军很大的威胁。我们一时也摸不清突进城内的解放军兵力有多大和他们所占领的位置。

东门突破，战斗进入市内。三月十二日六时，我到东门大街的鼓楼上观察情况，并指挥巷战。这时败退的部队均麇集民房内，解放军逐屋争夺，进展迅速。当时的情况是：如果不能把突入城内的解放军歼灭，外围兵团又不能及时赶到，洛阳势必解放，部队亦将遭全歼。我即连电南京告急，蒋介石回电说：“已饬外围兵团兼程驰援，希鼓励三军，坚守阵地……。”这实际上是一碗空心汤团。战至十二时，解放军已扩大到城区中心。这时洛阳专员刘焕东和县长郭某带了几十个警卫队，逃入洛阳中学核心阵地。大家都非常慌张。是日下午十四时，解放军各路大军复分由西门、南门、北门、东北门突入。蒋军仅保有西北角城墙一个阵地与洛阳中学的核心阵地。城内四处溃退下来的蒋军，被压缩到洛阳中学以南几条小街道的狭小地区内，乱成一团，极为狼狈。这时西工、九龙台、潞泽会馆的蒋军，仍负隅顽抗，枪炮声时断时续。

三月十三日，解放军发动了多次猛烈的攻势，首先是把各方面溃退下来的蒋军，扫荡歼灭于核心阵地以南地区。这时，蒋军内部已混乱不堪，火线上垮下来的纷纷向城西北角逃窜，遭到核心阵地守军的射击，打死打伤不少。在战斗中，第一旅旅长赵云飞被俘，第二旅旅长盛钟岳丢掉部队，化装藏匿于民家。至此，洛阳蒋军的主力已被歼，剩下来的只有核心阵地及西北城墙角一个多团的兵力。

解放军紧接着向核心阵地猛攻，杀声震天，战斗空前剧烈。据守核心阵地的蒋军凭借坚固工事，继续顽抗。我当时万分焦虑，但仍决心顽抗到底，连电蒋介石请饬外围各兵团兼程驰援，并请求加派空军助战。在最后的时刻，我仍向蒋介石狂妄地表示：“虽战至一兵一卒，决坚守到底，以报党国。”连日阴雨，气候恶劣，蒋机很少

活动,援军更无消息,但我自恃工事坚固,弹药充足,士气“旺盛”,解放军即使付出二千人的代价,也不一定拿得下我们的核心阵地,而久攻不下,势将撤退。我以为只要守住核心阵地,就可以打出第二个四平街来。因此,在十三日下午,我再次调整洛阳中学以南的阵地,继续抵抗。为了鼓励反革命士气和空联络,我命令将国民党的国旗悬挂在大楼的屋顶上。

三月十四日晨,战况沉寂。我爬上设在三层楼顶的观测所进行侦察,看到解放军将洛阳仓库的物资外运。我判断解放军主力可能西撤。但核心阵地仍处在层层包围之中。我又判断解放军因地面攻坚,伤亡太大,也有可能进行坑道爆破攻击。

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在三月十四日十四时左右,核心阵地突然遭到解放军各种火炮的轰击。炮火愈打愈密,愈打愈猛,炮弹像急雨般地倾泻在纵横不过百米的地区。两个钟头以后,炮击更为剧烈。工事打塌了,五座大楼都燃起熊熊之火,砖石乱飞,烟硝弥漫。南面两座高楼首先倒塌,据守在那里的总预备队无以容身,到处乱钻,院子里的吉普车,也炸得满身窟窿。伤亡越来越多,第四团代理团长朱飞当场被击毙,我的头部也被弹片炸伤。核心阵地的预备队几乎全部葬身于火海中。这时官兵都吓得呆如木鸡,谁也不敢露头。新闻处长赖钟声脸色惨白,东躲也不是,西藏也不是,最后才钻进一个“保险”的地下室(电报房)。赖这个人虽然是“蒋太子”的亲信,平时常引用“太子”的“名言”：“就是打到喜马拉雅山,也要和共产党斗争到底”,但当洛阳危急之后,他的怨言很多,懊悔不该来洛阳送死;他在遭到炮击后流露出来的怕死情绪,就更不用说了。

高悬在北面大楼屋顶上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子,在漫天的烟火中倒下了,它象征着反动派覆亡的命运!四十分钟的猛烈炮击之后,解放军从东、南、北三路向蒋军核心阵地突进。这时虽然已是夜间,但火光烛天,如同白昼,残余蒋军利用阵地内地堡顽抗,无奈解放军势若潮涌,堵不胜堵。当南面的大楼将倒塌的时候,我

转移到核心阵地的西南角地堡内，继续挣扎。参谋长刘宏远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钻到核心阵地中来，和我一同指挥战斗。

大势已去，残余蒋军一个个地从“乌龟壳”里被捉了出来，实际上抵抗已是无效了。而我当听到偃师和洛河边上传来紧密的枪炮声，又幻想援军已到，转身又跳进外壕，逃入坑道，并指挥坑道里的蒋军堵住东西两头的坑道口，心想哪怕多坚持一分钟也是好的。如同对垂死者注射强心剂一样，当核心阵地被突破之前，师部还向守核心阵地的第一团第一营和师直属军士队悬赏千万元，并先发一半，援军解围后再发一半。但是我们尽管挖空心思，也挽救不了被歼灭的命运。

这时，解放军用哨音指挥夜间战斗，联络非常确实，到了深夜二十四时左右，坑道的东口继被解放军突破。我从黑暗的坑道里被活捉了出来，从此才见到光明。据王凌云在解放后告诉我，当洛阳快要完蛋的时候，蒋介石曾派他乘一架小飞机来洛阳“救”我，飞到中途，因洛阳情况不明，中途折回南阳。否则，说不定我现在还处在黑暗的深渊中而不能自拔哩！

三月十五日上午，我在洛阳中学以南解放军的一个旅司令部里而，以一个被解放者的身份，受到陈赓司令员的召询。他以既严肃又宽大的态度对待我，并且微笑着和我握手，使我当时惊慌疑惧的心情逐渐安定了下来。他问我：“解放军从哪个城门首先突进？”“你们的情报从哪里得来？”“对待俘虏怎样处理？”我作了答复。他又问到我的家庭情况，最后要我到解放区的后方去，并给予我一些生活上的照顾。共产党把我从罪恶的深渊里拯救了出来，使我获得了新生，这种天高地厚的恩德，真是没齿难忘。

事后从家信中得知，就在我以一个战俘的身份进入解放区后方的时候，南京方面还派人索取照片，准备为我开追悼会来表彰“忠烈”，振奋士气呢！现在想来，可不是吗？旧的邱行湘已经死去，新的邱行湘正在党的关怀教育下成长着。

我在洛阳顽固的挣扎，造成了滔天的罪行。论罪，几十个头也